

大连文史资料

第一辑

(内部发行)

赠阅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大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大 连 文 史 资 料

第 一 辑

大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大连市重型机器厂印刷厂印刷

目 录

- 创建大连育才学校的回忆 李光 (1)
满铁大连图书馆 杨力生 (11)
血泪浸透“碧山庄”——解放前大连码头工人
的苦难生活 刘永才、孙淳夫、陈士聪 (26)
大连油坊业的沧桑与反日工潮 陈士聪 (38)
清末庄河抗捐首领潘永忠
..... 潘世和、宋仞千等口述、于志龙整理 (43)
响应辛亥革命的复州民军
..... 顾崇恩口述、复县政协文史组整理 (50)
有关柳亚子先生及先父李汝航的几首诗
..... 李启文 (55)
从髯翁子右任学书琐事 冯树国 (59)
一代短跑名将——刘长春 邹继豪 (62)
刘长春青少年时代的二三事 安立宾 (85)
大连最早的一支足球队——中青队 程健 (88)
曹艺斌的艺术生涯 马明捷 (90)
抗战胜利后大连地方金融简况
..... 孙耀庭口述黄本仁整理 (107)
金县益昌糕点店 吴承宝 (112)
金州小吃 童孝大 (117)
轶事七则 孙宝田 (121)

- 大连名称的由来 倪志正 (128)
近代大连记事 孙棫蔚、陈士聪 (133)
编后 (178)

创建大连育才学校的回忆

李 光

一九四九年二月，我奉命负责筹建大连育才学校，直到一九五四年一月调到沈阳。短短的五年时间，这座以接收烈士子女、志愿军干部子女和地方干部子女的学校从无到有，直至发展成为一所包括幼儿园、小学在内的能够寄宿的中学校，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一、筹建和建校初期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我军胜利的结束了辽沈战役，解放了东北全境。党在东北的工作任务十分艰巨。当时旅大地区由苏联红军占领，尽管有国民党的层层封锁，政治、经济形势还是比较稳定，但小孩子上学却很困难。随着我军的胜利，在大连集中着的由延安和关里老革命根据地来的大批干部要迅速向全东北以及全国进军。这些同志虽然已经参加革命多年，但大部分同志的家当，只是一套被褥。唯有送子女上学成为他们的一桩心事。

为了减轻干部的后顾之忧，中共旅大地区党委决定尽快成立一所能够寄宿的学校，集中招收烈士子女和干部子女。

一九四九年二月的一天，区党委副书记郭述申同志邀我到他办公室。郭书记开门见山地告诉我：“区党委决定成立一所学校，准备派你去筹建，担任党支部书记、副校长。校长请毛达瑜同志（当时是大连市市长）兼任，你有什么意见？是不是回去和丁哲民同志商量一下？我想他会支持的！”

当时我在旅大市妇联担任组织部长，对党分配的工作当然没有二话。虽然我自一九三六年参加共青团组织以来，长期从事妇女工作（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担任河北省饶阳县妇联主任，曾在冀南区妇联会工作），对妇女工作比较熟悉，也有着更加深厚的感情。我爱戴了哲民同志是旅大团市委副书记（后为书记），当时我们的长子六岁，女儿四岁，如何送他们上学、上幼儿园（当时称为幼稚园）一直是让我们发愁的事。前不久，哲民同志对我说，如果能够办一座学校，把烈士子女、干部子女负责管起来，那可给广大干部解决了大问题。

想到这，我感到区党委的决定具有深远的意义。党的信任和委托，广大干部，尤其是烈士遗孤的热望，使我愉快地担当了这一抚养革命后代的重任。

学校筹建经费由旅大行署教育厅直接拨给，开办费共计三十万元。校址选在劳动公园东侧内的一所原日本学校（即现在的大连市二十四中学校址），定名为大连市育才学校。根据区党委指示和广大干部尽快开学的要求，我们首先抓紧时间修复校舍，进行筹备，于秋季开学。

日本人撤走后，校舍破坏严重。主楼当时已经没有屋项。偌大的院子里堆放了大批垃圾。主楼道东、道北的两处宿舍也已经破烂不堪，急需维修。

幼儿园园地选定在劳动公园北端的一个教堂（即现在大连市艺术馆）。路西有一所日本人的神社，也拨给了我们。定名为育才幼儿园。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建，在大连市教育局范围内挑选了一批教师到学校。这样，到七月份已经有教职员四十多人，学校和幼儿园均已初具规模。

一九四九年八月，大连育才学校和附属的幼儿园同时开始招生。消息传出，旅大地区广大干部拍手称快，互相传告。

当时入校的烈士子女和干部子女，须有区党委组织部干部科长李蒿峰同志（李蒿峰同志，后曾任中共沈阳市委副书记）的批字。由于孩子的家长大部份都在大连市，所以开始时收录的住宿生不多，只有百名左右，其余的二百多名学生只在学校吃一顿午饭。

一九四九年九月一日，在育才学校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大连市市长兼校长毛达珣讲了话，旅大区党委宣传部部长邹问轩同志亲临祝贺。这给全校师生很大鼓励。

在筹建学校过程中，党支部既要抓教职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又要抓行政工作，任务很艰巨。毛达珣同志在市政府工作繁忙，但仍经常到学校来听汇报，谈工作，具体研究和部署校园的规划、筹建等很多具体问题，如人力、物力、建筑材料等，大都是经他批准，大连市政府给解决的。在筹建学校的过程中，毛达珣同志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位热心教育的市长直接抓，大连育才学校筹办的速度和质量不可能如此之快和如此之好。

育才刚开学一个月，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宣告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毛达珣市长在一九五〇年春天由湖南陆续请来了教师六人，增设了初中班，向十年制中学实验阶段发展。这时学校已经有教师四十余人，这就把如何使用知识分子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

我们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建国前，党外的知识分子确实处在动荡之中。他们中的有些人由于接受了各种消极影响，对共产党能否掌握政权、能否办好教育持观望甚至怀疑态度。但其中绝大部分是爱国的。党支部对教师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对他们大胆放手使用，政治上给予充分信任，业务上给予实践和提高的机会，生活福利上给予优先照顾。我们对知识分子进行历史的分析，认为他们有文化，有能力，同时又有一定的思想包袱。党支部组织他们学习政治时事，学习中央负责同志有关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的讲话，宣传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帮助他们卸包袱。使教师们感到党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和关怀，从内心认为自己是“育才”的主人翁，增强了责任感。

比如，有位张老师，是位老生物教师，他从湖南到旅大后，由于家乡口音很重，讲课有困难，便主动承担了生物实验室的工作，负责辅导学生制作标本、栽果树。把园艺生物实验搞的生气勃勃，受到学生的爱戴。当时大连育才的园艺是全市著名的。菜园里每年都有春、夏菜。收获水果则都放到学生餐厅里给大家吃，使学生不仅增长了知识，而且增加了集体观念，感受到劳动的光荣和幸福。这样，全校师生对参加园艺劳动的兴趣更浓了。

为了提高师资队伍，我们加强了教师的政治思想教育和业务学习。当时除星期日以外，没有家务负担的教师，基本

上每周六天都在学校住。我们组织了教学观摩，校领导轮流听课，参加教研组活动，党支部书记担任政治课的教学。星期日和节假日组织学生野游，密切师生关系。

这里，我着重回忆一下曾经为大连育才的建设做出了可贵贡献的几位同志。

戴忠明同志，原育才幼儿园副园长、园长。她是湖南人，出身自由职业者家庭，她兄妹多，父亲早逝，为了照顾弟弟，她读完师范学校就参加了工作，多年从事教育事业，并且供弟妹上学。在她的影响和资助下，其弟、妹均受到了高等教育，并且陆续参加了革命工作。如她妹妹黄葳同志（曾任黑龙江省科委主任，现任国务院科技干部管理局局长）就是由清华大学毕业，投身革命的。忠明同志献身于教育事业，一生未曾结婚。她于一九四九年由青岛到大连育才幼儿园，一直到一九六八年退休，始终在幼儿园主持工作。一九八一年病故于北京后，她的胞妹黄葳同志将忠明同志多年的积蓄万元人民币献给了旅大市儿童基金会。

忠明同志待人和蔼，热情诚恳。她生活简朴，严于律己，幼儿园的教工们都尊称她为“戴大姐”。这是一位热爱党，热爱幼儿事业的好同志。

大连育才教导主任杨开英同志，是杨开慧烈士的堂妹。她细长的身材，戴着近视眼镜，给人文雅的感觉。但在她身上，却有着火一样的热情和毅力，工作起来往往忘记了时间，不分昼夜，不知疲倦。她毕业于湖南大学，一九五〇年初来到育才后，一心在如何搞好教学上下功夫，她学习苏联十年一贯制的学制，提高教学质量，进行教材的改编，总结了学校几个年级的教学经验。虽然当时她已经是年过三十岁的大姑

娘，但对个人问题却很少考虑。在大连育才工作期间，她把全部精力都投入教学和管理孩子身上。杨开英同志为人正直，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她于六十年代病故于北京。

大连育才从筹建到办校比较顺利，首先是旅大区党委、行署的重视和在实际工作上的支持，选派了比较坚强的干部，有毛达珣市长的亲自领导；其次是党支部。虽然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也伤害了某些同志的感情，至今尤引为内疚，但是总的来说，还能比较正确地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建国前后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诸如三反、五反运动和抗美援朝斗争，都由于党、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而胜利完成。党支部还注重吸收政治上比较成熟，够条件的知识分子入党。几年来陆续发展了李秀英、李德连、李芹芝等同志为中共党员，由李德连同志兼任团支部书记，不断吸收优秀青年入团。

大连育才办的比较顺利，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得到了社会上各方面的支援和重视。比如人民解放军大连海军学校，从党委到教职员对大连育才多方面给予支持，代请了有教学经验的教师李钦芝等同志到育才任教；旅大苏联侨民学校在提供十年一贯制的教科书和传授教学方法上给予了支援。在战备上得到了旅大行署和防空指挥部全力支持。一九五一年、五二年正是抗美援朝紧张阶段，大连市防空任务紧急，全校四百多名孩子七岁以下的一百名，行动不便。防空指挥部拨出专款在劳动公园北山沟里修了防空洞，有住屋、厕所和仓库，还有照明设备。防空指挥部派出专人指导施工，还指导和帮助全校师生进行防空演习。

二、抗美援朝开始后学校的情况

一九五〇年十月，抗美援朝开始。随着志愿军入朝参战，上级党委指示大连育才学校迅速接收志愿军干部子女入学。这些孩子要全部寄宿学校，并享受供给制待遇。这项政治任务，准备时间短促，担子很重。由于学生数量突然增加，带来许多困难。经过党支部的动员，全体教职员都纷纷表决心，一定圆满完成党托付的光荣任务。全校立即行动起来，扩建教室、寝室和食堂，迎接新生的到来。

志愿军子女是由中共东北局组织部分批介绍来的，每批十几人到几十人不等。学校组织了专门接待班子，到火车站和码头去接。连续接了两个月才全部到齐，到校一百二十余人，最小的六岁，大的十五岁。孩子们到校后，立即进行体检。因为有些孩子来自农村、边防，学校对他们的健康状况必须全面掌握。记得有个男孩子是山东来的烈士子弟，他的父母均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跟随伯父生活，后被哥哥接到大连抚养。入校时发现患有麻风病，很快被送到大连麻风病岛上医治去了。由于治疗及时，既使病孩早日康复，又免传染他人。

一九五一年春天学校里发现了猩红热。为了立即控制这种传染病的扩散，我们把患病孩子所在的班级进行隔离。接着全校动员大搞卫生。使我难以忘怀的是，正在大连疗养的蔡畅大姐在区党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同志陪同下来校视察。蔡大姐和欧阳钦同志视察后，亲切地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没有别的困难，就是担心猩红热蔓延开来。没想到过了两天，

行署韩光主席来了电话，说蔡大姐给孩子们请到了苏联红军医院的小儿科医生，让我们立即带着翻译到苏军医院去接。我们被蔡大姐的关怀深深感动。我一句简单的话，却被蔡大姐认真地当做一件大事抓紧解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多么关切革命的后代啊！我们立即随同行署的俄文翻译接来了苏军小儿科医生。这是位四十岁左右的女军医，是苏军医院的儿科主任，她工作起来不分份内份外，每周到校工作两天，从环境卫生到学生健康检查，直到医务室病号的治疗，都非常严肃认真。我们医务室的专职护士和医士都有了依靠。从此，我们有了学校的兼职校医。

对学校的建设，区党委十分关怀。欧阳钦、韩光、郭述中以及任仲夷（旅大团市委书记、区党委秘书长）、组织部长胡忠海、宣传部长邹闻轩等领导同志都亲临学校检查工作。

徐海东同志也到校巡视过。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军对如何办好学校十分关怀。有个星期日，徐老乘车来到校园，他说：“我有肺结核，学生在校时我不敢来；学生离校后我来看看校园，也是我最大的快乐。”

后来，徐老曾专门约了毛达珣、杨开英和我一起来到大连岭前他的休养地交谈，还请我们吃了“鱼翅席”。老革命家的关怀，使我们深受鼓舞。

永远使我难忘的是，一九五一年元旦，在为苏联红军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敬爱的周总理关切地找毛达珣同志和我到他面前，周总理和蔼地询问：“你们是大连育才的正、副校长吗？你们是培育人材的学校啊！我通过欧阳湘（欧阳钦同志之子）知道你们学校很注意学生智力和德育的培养。要教育孩子们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特别是干部子女，要打消

优越感，不能比谁的爸爸坐车还是步行上班。要教育他们比吃苦，比为党为人民作的贡献！这要靠你们在教育上去创造，方法要生动活泼，为孩子们所喜闻乐见。建议你们让孩子们学点历史知识。只有知道祖国历史的人，才能更爱自己的祖国。”凝视着周总理慈祥的面容，我的心情激动不已。周总理接着又微笑着说道：“昨天我手把着湘湘的手教他写毛笔字，你们可以让孩子们写写毛笔字，每天有几十分钟也可以，天长日久见功夫啊！”周总理一席话，给我们指明了办学方向。第二天我们向全校师生传达了周总理的教导，并发动师生讨论如何贯彻执行周总理的指示。经过讨论研究决定，要正确贯彻德、智、体的全面教学方针，为祖国培养合格的后代。教职员一致同意在课程内每天增设四十分种的毛笔字课，其它课程的教学要生动活泼，易于学生接受；图书馆补充了许多中国古代历史通俗读物。针对学生住宿生较多，组织了许多课外活动小组，如：讲演小组、园艺小组、地理、美术、航空小组等等。全校每周举行一次故事会，学生们上台去讲述中国古人的故事，有岳飞、岳云、周处等故事，既组织学生学了历史，又锻炼了学生的思维和表达能力。在美术和地理小组，学生们画了历史连环画和祖国地图。在品德教育上正式向学生们提出了“五爱”的内容，这就是：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为了让学生们牢记并身体力行，要求教职员以身作则，起表率作用。我们将“五爱”以五尺见方的大红字写到教学楼的墙上，学生一进校就看见，每天做操集会都站在“五爱”标语的前面。同时学校也向学生和家长提出不要搞特殊，不许乘坐家长的专用车，不许往学校带食品、用具等等。

在周总理指示教诲下，育才学校师生员工掀起了办好学校，为祖国培养优秀人材，为志愿军抚养好孩子，为革命教育好后代的热潮。

最后，还应该提到的是大连育才学校的好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欧阳湘同志。

欧阳湘是欧阳钦同志的独生儿子，一九六七年被林彪一伙迫害致死时年仅二十七岁。湘湘在育才时就是个好学生，他功课好，学习成绩优秀，懂礼貌，爱劳动，尊重师长，爱护小同学，生活艰苦朴素。一九五三年他随欧阳钦同志到哈尔滨，在高中学习时仍然是好学生，一九五八年他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在学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到长春光机研究所搞科研。“文化大革命”初期，欧阳湘满怀对党的热爱、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写信给省委转党中央，提出要警惕野心家篡权，却被林彪一伙诬陷为“内奸”、“反革命”，拉到哈尔滨批斗，并被迫害致死于长春。

文化大革命前的每年春节，湘湘都要到我家，说是来看望老校长。象湘湘这样对同志有深厚感情，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好学生，大连育才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现在我对不少好学生都记忆犹新。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组织上调我去沈阳，委派东北局机关党委副书记张煜同志来大连育才任校长。这是位参加革命工作多年的老同志。后来她也调到黑龙江，任省科委副主任。现在张煜同志已经在沈阳离休。

满铁大连图书馆

杨力生

大连，这个祖国美丽的海滨城市，历史上几经沧桑，帝国主义对它进行过一次又一次地殖民统治。1905年9月5日发生在这一片土地上的日俄战争结束后，日俄间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大连，也就由俄国的殖民统治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了。1906年6月7日（清光绪32年4月14日）日皇以“一四二号敕令”，公布“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置本社于大连，设支社于东京”。1907年4月1日正式开张营业。

（一）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是日本帝国主义设在大连的一个侵略机构。第一任满铁总裁后藤新平草拟的《满洲经营策梗概》中供认：“是代替（日本）政府经营南满洲。”

满铁大连图书馆，是满铁这个侵略机构的图书、情报基地。它既是储存文献资料的中心，也是领导铁路沿线二十四所图书馆的中心图书馆。他们的办馆宗旨很明确。在《满洲教育史·满铁图书馆》一书中明明白白地写着：“图书馆的

主要任务就是用所藏图书，配合当时的形势发挥其作用。”为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政策服务。

满铁成立那一年，也就是1907年，调任满铁理事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冈松参太郎，为了文化侵略的需要，在满铁调查部的隶属下成立了图书室。室址在原大连儿玉町满洲资源馆三楼。1908年，满铁办公地点转移，图书室也随之搬迁到大连东公园町（现世纪街），设于满铁人事课的一处房间。

由于这个图书室，不能满足调查部“工作”上的需要，冈松参太郎本人对利用图书馆进行侵略又有极大野心，因而声称：“要在满铁附属下，建设一个东亚一流的、具有近代建筑美的理想图书馆”。于是，便在1911年8月，于东公园町29号一处，面积为5,872平米的地方开始兴建图书馆。

图书馆建筑工程共分三期。以建筑面积为390.09平米的六层书库为中心，延伸左右两翼二层办公楼房为第一期。自1911年8月动工，至1913年8月竣工。书库所用的书架，是美国斯尼依德公司专利的钢铁书架，从地下室到最高层六楼，上上下下全部贯通。第二期是书库前面的大阅览室，建筑面积为198.36平米。1918年11月动工，次年9月完成。第三期是建筑面积为116.23平方米的六层楼房新书库。1926年9月始建，1928年12月完工。至此，这个为日寇侵略中国服务的图书馆新馆舍全部落成。

建着书库和阅览室的先后建成，满铁于1918年1月15日以总事甲第632号通知，将原属调查部的图书室，改隶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直接领导，名称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馆”。1919年9月，该馆重新制订了规则，规定主要开展对满铁业务的参考工作，并兼代提供公众阅览，遂于同年10

月1日，正式开放。

从1907年满铁调查部创建第一个图书馆始，到1919年的十余年间，满铁共建立了24个图书馆。分布在铁路沿线的有：奉天、瓦房店、大石桥、营口、鞍山、辽阳、苏家屯、奉天八幡、铁岭、开原、四平街、公主岭、长春、本溪、抚顺、安东等16个馆。在大连市内除满铁图书馆外，尚有日出町分馆和日本桥、伏见台、近江町、埠头、沙河口、南沙河口等图书馆。此外，对边远地区还进行了划区（划了12个流动区）、定点（定了150个阅览点），作为巡回流动阅览。这些铁路沿线图书馆和流动区、阅览点的业务联系与书刊互借，统一由满铁图书馆掌握。如此组织、设置，便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图书馆网络。为便于管理和与其他各馆区分，1922年6月19月，根据社规第9号通知，又将满铁图书馆改称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

（二）

满铁大连图书馆，明确规定要“广泛搜集古今中外的图书资料，供给会社业务的参考”。因而，它是被特定为满铁的“参考图书馆”。

为满铁业务执行“特定参考任务”的大连图书馆，对它借以服务的图书，则采取多样手段，通过各种渠道，或强取豪夺，或重金收买，又多次拨专款、派专人到国外和关内进行搜刮收集。

1917年为纪念满铁会社创建十周年，拨发图书专款三万日圆（下同），以资采购。